

特約撰述

# 美國霸權前景與 G-9 世界之浮現

## Future of US Hegemony and the Emerging G-9 World

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 壹、美國大選與分裂的社會

時隔一個半世紀，美國再度迎來另一次嚴重的社會對立。

一般認為，1860 年總統大選乃是美國歷史上爭執最激烈、分歧最嚴重、衝擊也最大的一次；面對國家迅速擴張帶來的中央與地方分權爭議，以及由此引發的蓄奴問題與社會階級轉型壓力，由剛剛在 1854 年成立之共和黨支持的 Abraham Lincoln，甫當選便面對數州宣佈脫離聯邦引爆的內戰。<sup>1</sup>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民主黨受制於擁護商業和白人利益的保守派白人，<sup>2</sup>共和黨則相對代表主張改革的力量，如今雙方似乎主客易位；其次，前述對立雖帶來慘烈內戰，結果卻普遍被視為一場「二次革命」，藉此彌合裂縫的美國迎來跨入現代工業社會的分水嶺，並奠定半世紀後登頂全球霸權的基礎。

---

<sup>1</sup> 此一內戰由 1861 年延續至 1865 年，估計約有 10% 的 20-45 歲北方男性和 30% 的 18-40 歲南方白人男性在戰爭中死亡，儘管廢除奴隸制的憲法第 13 修正案在 1865 年底生效，一般認為其目的在解放勞動力，而非追求種族平等，因此，歧視爭議仍在 1960 年代引發一波民權運動。

<sup>2</sup> 民主黨源自 Thomas Jefferson 在 1792 年建立的民主共和黨，Andrew Jackson 則在 1828 年建立現代雛型，主張驅逐印地安人並於內戰中支持奴隸制。

與此對比，國內社會再度陷入兩極對立不僅成為 2020 年大選中最熱門的話題，其醞釀其實可以追溯回 2008 年。在次貸風暴與金融海嘯陰影衝擊下，社會議題非但難得地在 2008 與 2012 年連續成為總統大選交鋒重點，基於民主機制強調政黨競爭之催化，2016 年更由討論焦點轉化成分裂對立的來源，如同 Fukuyama 所稱，該次大選揭示了當代美國正遭遇嚴重的政治危機，根源主要來自無法解決的社會階級和貧富分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美國夢之幻滅」，至於因制度瑕疵導致的選舉結果爭議（川普以較少選民票當選總統），亦不啻在撼動執政正當性之餘，導致雙方在選後繼續彼此攻訐。<sup>3</sup>

2020 年，美國再度迎來了一次大選；如同諾貝爾經濟學家 Paul Krugman 指出的，當前美國社會「到處充斥瘋狂陰謀」，最終勝出者勢必致力彌平人民之間的政治傷口並進行聚焦「社會融合」的民主重建，但談何容易？從若干共和黨菁英不惜在 2019 年推出以「反川普」為號召，甚至公開支持對手 Biden 的「林肯計劃」(The Lincoln Project)，<sup>4</sup>顧名思義，清晰可見美國社會到處瀰漫的焦慮感。即便如此，多數觀察家對於選後美國社會對立是否可能稍減，依舊抱持著相對悲觀態度。

## 貳、第二波衰落論陰霾不去

如同雖然前途未定，所謂「中國威脅論」早自 1990 年代就逐漸存在於媒體與政治學術菁英圈討論一般，<sup>5</sup>即便美國目前依舊是世界

---

<sup>3</sup>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95:4(2016), pp.58-68.

<sup>4</sup> 該計畫以政治行動委員會 (PAC) 形式，由若干具影響力之共和黨人在 2019 年 12 月 7 日成立，2020 年 4 月正式宣告支持 Biden，同年 11 月 7 日聲稱任務完成。

<sup>5</sup> Barber B. Conable, Jr. and David M. Lampton, "China: The Coming Power," *Foreign*

第一大經濟體與公認霸權，關於其可能衰落之看法，亦早在半個世紀前（尤其 1973 年美國撤出越南與 1973-74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結束之後）便悄然浮現，例如 Richard Rosecrance 在 1976 年指出，美國作為「國際體系維持者的角色已接近終結」，必須轉型成為一個「普通國家」，<sup>6</sup>Robert Keohane 隨後在 1984 年以「霸權之後」為名出版專書並開啟了自由制度主義之世界秩序討論，<sup>7</sup>至於 Paul Kennedy 在 1987 年以歷史類比分析為基礎，試圖「以史為鑑」，透過十六世紀以來歐洲霸權興衰歷史來預測美國的未來，<sup>8</sup>不僅引發討論關注，同年 10 月 29 日爆發之「黑色星期一」華爾街股市暴跌，更透露十足「末日」景象。

無論如何，隨著 1991 年蘇聯瓦解與冷戰終結，1980 年代的第一波衰落論乃軋然而止，其後，在 Clinton 時期（1992-2000）休養生息與後冷戰和平紅利刺激下，都促使《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s*）在 1999 年底迎接千禧年時指出：「美國就像是一個跨坐在地球上的巨人，主宰著商業、貿易與運輸等領域，不但其經濟乃世界上最成功的，軍事力量也無人能及」，<sup>9</sup>據此，以美國為主之「單極世界」的鞏固在新世紀初似乎成為可以預期的結果，甚至「新的單極主義不但將指出我們所存在之世界的獨特性，也象徵美國後冷戰外交政策的

---

*Affairs*, 71:5(1992), pp.133-149; Yi Edward Yang and Xinsheng Liu, "The 'China Threat' through the Lens of US Print Media: 1992–200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1, Issue 76(2012), pp.695-711;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 eds.,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2).

<sup>6</sup> Richard Rosecrance, *America as an Ordinary Country: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Fu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sup>7</sup>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sup>8</sup>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sup>9</sup> See "America's World," *The Economist*, October 23, 1999, p.15.

新開端」。<sup>10</sup>正因美國得以繼續扮演超強角色，關於進一步建構「帝國」之積極論調也開始浮現，<sup>11</sup>例如新保守派在 1997 年創設之「新美國世紀計畫」(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 便為主要代表；儘管前述思維並未真正成為學界主流，重視提高美國對全球事務積極度的意見確實佔據上風，多數人為美國設想的角色乃擔任各地區的離岸平衡者，目的在維持並符合其自身利益。<sup>12</sup>

只不過，前述對美國有利之形勢隨後迎來兩大衝擊，亦即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與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前者為華府帶來威望與經濟雙重傷害，後者更直接衝擊支撐霸權之經濟基礎。

儘管 2001 年安隆 (Enron) 與 2003 年世界通訊 (WorldCom) 相繼破產已提供明確警訊，Nouriel Roubini 在 2006 年 7 月 17 日一篇題為「A Coming Recession in the US Economy?」文章，仍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陡然蔓延後，為他贏得「末日博士」稱號。事實上，面對前述危機持續擴大，Roubini 與 Ian Bremmer 一方面在 2011 年共同撰文強調一個「零強世界」(G-Zero World) 之來臨，<sup>13</sup>後者更於翌年出書強調，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中，已經「沒有任何單一國家或國家聯盟能夠領導大家共同應對全球挑戰」。<sup>14</sup>

---

<sup>10</sup>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 Michael Brown et al.,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pp.305-09;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New Unilateralism," *Washington Post*, June 8, 2001, p.29.

<sup>11</sup> Robert Cooper, "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 *The Observer*, April 7, 2002.

<sup>12</sup> Ariel Cohen, John Hillen, Thomas G. Moore, James Phillips, James J. Przystup, Thomas Sheehy, and John P. Sweeney,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America," in Kim R. Holmes and Thomas G. Moore, eds., *Resto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A U.S.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Blueprint*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96), p.43.

<sup>13</sup> Ian Bremmer and Nouriel Roubini, "A G-Zero World: The New Economic Club Will Produce Conflict, Not Cooperation," *Foreign Affairs*, 90:2(2011), pp.2-7.

<sup>14</sup> Ian Bremmer,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 (New York: Portfolio, 2012), p.1.

就在部分經濟學家提出警訊之際，《自然》(*Nature*) 科學期刊雖在 2010 年刊出一篇文章，預測到了 2020 年，連結網路裝置將可使我們直接根據腦部訊號進行搜尋，糧食作物質量可以在 3 小時成長一倍，人類可望告別對石化燃料的依賴，但若干星期後所刊出由另一位生態科學家 Peter Turchin 撰寫的文章，卻為此種樂觀主義罩上陰影。<sup>15</sup>Turchin 試圖跨界進行政治預測，並以經濟貧困、內部精英競爭和國家能力作為主要變數，設定了一個「政治壓力指數」，並指出此指數每半世紀都會達到某種峰值，過去幾次分別是 1870、1920 和 1970 年；延續 2003 年《歷史動力學》(*Historical Dynamics: Why States Rise and Fall*) 一書的關注焦點，他將此種循環性興衰稱為「俗世週期」(*secular cycles*)，據此，公共債務增加、實際工資下降、畢業生過剩且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美國，或將在 2020 年迎來一陣社會動盪高峰。

由於 Turchin 的預測「驚人命中」美國 2020 年大選現況，自然引發熱烈議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前述經濟與自然科學家從不同角度「唱衰」美國，《時代》(*Time*) 雜誌在 2011 年 3 月份也以「Yes, America is in Decline / No, America is Still No. 1」正反辯論作為封面主題，加入二十一世紀初第二波美國衰落之討論行列。

### 參、陰影下的美國霸權地位

同樣加入第二波衰落論行列者，還有在 1980 年成功預言柏林圍牆將於 10 年內倒塌的挪威學者 Johan Galtung，他在 2009 年撰書指

---

<sup>15</sup> Peter Turchin, "Political instability may be a contributor in the coming decade," *Nature*, 463(2010), pp.26-32.

出美國霸權的 15 對矛盾，並預言其帝國將於 2020 年崩潰。<sup>16</sup>至於英國學者 Vassilis K. Fouskas 與 Bülent Gökay 則延續 Charles Kindleberger 的霸權穩定論觀點，從金融公共財失靈角度，在 2012 年預測美國即將走向衰落結局。<sup>17</sup>

作為既存霸權，美國之相對地位與自身發展穩定度，與全球結構穩定自然息息相關；儘管它迄今仍為無疑之軍事霸權（軍事支出在 2019 年仍佔全球 38%，明顯領先其次中國的 14%，並擁有最龐大之航母艦隊與海外基地群），經濟影響相對衰退（從戰後 1950 年佔全球 GDP 約 50%到 2019 年約 24.8%）不僅大幅削弱其軍事潛量，何況從伊拉克戰爭、金融海嘯爆發、ISIS 擴張，以及 Trump 明顯之「退出主義」政策看來，美國維持秩序能力不免備受質疑。

更受各界關注的，是在伊拉克戰爭與金融海嘯衝擊下的國債累積速度，其總額從 2000 年的 5.6 兆，2008 年突破 10 兆，2016 年到達 20 兆，至 2020 年底估計將達 30 兆美元，不僅平均 8 年便呈現倍增，若根據 OECD 的廣義算法（同時計入聯邦負債、政府公債與地方債務），則美國國債 GDP 占比在 2012 年便超過 100%，2015 年更來到 125%，即便以狹義計算也即將在 2021 年越過 100%大關，並將於 2022-23 年超過 1946 年因二戰創下的 106%最高紀錄。

前述債務壓力非但使居於世界球經濟體次位的中國，GDP 超越美國的預測時間從 2035 年提前至 2028 年，<sup>18</sup>由於 2020 年 COVID-19

---

<sup>16</sup> Johan Galtung, *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 - And Then What?* (New York: TRANSCEN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up>17</sup> Vassilis K. Fouskas and Bülent Gökay, *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 Global Fault-Lines and the Shifting Imperial Order* (London: Pluto Press, 2012).

<sup>18</sup> 包括國際貨幣基金（IMF）、日本經濟研究中心、英國經濟商業研究中心（CEBR）等在 2020 年底都做出類似預測。

疫情肆虐全球，一般認為，此次疫情對世界經濟衝擊乃 1930 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作為確診與死亡人數最高的國家（全球確診數在 2020 年底突破 8000 萬，美國近 2000 萬例），美國商務部宣告 2020 年第一季成長率為-4.8%，乃是自 2014 年第一季以來首次出現負成長，也是 2008 年第四季以來衰退幅度最高的一季，全年預估為-4.3%。長期作為全球成長引擎的中國雖不例外，2020 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為-6.8%，全年仍有 2% 正成長；至於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在 4 月公布之報告中，自 2013 年以來首度刪除「復甦」字眼，且為受金融海嘯影響之 2009 年 5 月以來首度使用「惡化」字眼來形容自身現況，全年預估為-5.6%。根據聯合國發佈的 2020 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WESP）期中報告，同樣指出全球將面臨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衰退。

進言之，美國因此波疫情死亡人數在 2020 年 12 月 12 日來到 29.7 萬，正式超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陣亡人數，且相較二次大戰長達 4 年，目前累積人數只花了一年時間；其次，美國雖曾因參戰債台高築，相較戰爭經濟仍提供重大成長刺激，目前疫情則將經濟帶入寒冬期。可以想見，即將於 2021 年上任的 Biden 政府勢必通過紓困方案，但此舉對已然債台高築的美國而言，不啻雪上加霜，唯一能寄望的只有新年度的經濟復甦反彈力道。

#### 肆、後美國時期全球新均勢走向

Fareed Zakaria 在 2008 年以《後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這個聳動書名嘗試描述，目前世界或正在經歷著一個「群雄並起」（the rise of the rest）的階段，「在政治和軍事層面上，我們仍

然處於單一超強世界，但產業、教育、社會、文化等其他面向，則權力正在轉移並逐漸脫離美國支配；這並不表示我們進入了一個反美的世界，而是說我們已邁向一個由許多地區和個人共同界定與監督的後美國世界當中」；<sup>19</sup>在這個新時代中，一度傾頹的俄羅斯正重新崛起，歐洲目前步履蹣跚但未來不可小覷，中國實力雄厚且影響勢必無可迴避，日本與印度雖然各有內部問題但潛力可觀，至於中東、拉丁美洲與非洲等地區，儘管缺乏有力競爭者，卻是重要的地緣問題製造來源。<sup>20</sup>正是由於前述高度不確定性，Ian Bremmer 認為目前世界已然進入一個「人人為己」的狀態當中。<sup>21</sup>

表：主要大國影響係數參考比較

	綜合國力指數	擴張指數	影響係數
美國	5	4	20
中國	4.5	3.5	15.75
俄羅斯	4	4	16
德國	4	3	12
日本	4	2	8
法國	3.5	3.5	12.25
英國	3.5	3	10.5
土耳其	3	4	12
印度	3	3	9

在上表當中，茲選擇目前世界中具相對較高之綜合國力（同時考量軍備規模與經濟能量）與國際動能（外部事務介入性）之 9 個

<sup>19</sup>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2008), pp.4-5.

<sup>20</sup> George Friedman, *The Next Decade: Empire and Republic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Anchor, 2012).

<sup>21</sup> Ian Bremmer,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



國家，同時由前述兩項變數加乘得出其可能之國際影響係數，或可供思考所謂「後美國體系」時作為參考。

(1) 美國：現況與挑戰已如前述，除因 COVID-19 疫情與大選牽動社會對立氛圍，以致在經濟與社會方面承受重大壓力，即便軍事能力依舊無可匹敵，經濟壓力（自身發展與中國追趕）加上原有地緣劣勢（遠離世界島），致使其客觀投射能力遭到高昂且愈來愈難負荷之投射成本抵銷。

(2) 中國：中國雖在 GDP 與國防開支部分都僅次於美國，近年來軍備更新內容與速度亦均引發注目，2014 年後以「一帶一路」為名之戰略布局更受全球關注，一方面自 1979 年以來便不曾動武，近年來活動足跡雖遍及全球，多數政策關注仍以周邊事務為主，即便給予美國最大壓力並成為其戰略圍堵核心，未來仍有待觀察，至於 2021 年百年黨慶、2022 年「二十大」（習近平是否確定連任及其新戰略布局）乃短期焦點。

(3) 俄羅斯：作為冷戰時期超強之一，雖因蘇聯瓦解以致力量稍減，橫跨歐亞並可直接影響「心臟地帶」（內亞）之地緣位置、僅次於美國之核武庫，加上豐富原油蘊藏，仍使其具備極強之國際政治競爭力；近年在 Putin 帶領下，包括透過介入敘利亞內戰以便將勢力深入東地中海，收回克里米亞並支持烏克蘭叛軍以影響黑海，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互為犄角，因應氣候變遷重新開展北極地區佈署等，皆使其綜合實力雖稍遜北京，能動性卻遠有過之。尤其是 Putin 自 2000 年上台後，迄今已成為全球主要國家在位最久的領導人，2004 年上任的 Lavrov 也是任職最久的外長，兩人豐富經驗值絕對是俄羅斯珍貴之隱形資產。

(4) 德國：受到位居歐洲中央地緣限制，戰略思考相對雖略嫌保守，但在 Merkel 自 2005 年迄今長期領導下，政治相對穩定（她雖宣稱 2021 不再連任，但前景未明）且經濟發展亦穩健成長，一方面 Merkel 自 2014 年以來持續負責 G7 協調事務，2010 年爆發歐債危機以來，德國又作為歐盟中流砥柱，加上透過 NATO 機制積極參與自地中海、北非至中東事務，都讓德國充滿競爭力，至於「後 Merkel 時期」或為隱形挑戰所在。

(5) 日本：自 1968 年首度超越西德後，直到 2010 年為止，日本長期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sup>22</sup>儘管 1990 年代以來長期陷入泡沫危機，由於基本面（基礎建設與研發能量）良好，國際經濟影響力不低且軍備能力不容小覷。儘管如此，受限於憲法和平框架（第 9 條自我設限戰爭權力）、國內社會非戰輿論，以及美日同盟對其活動制約，「經濟巨人、政治侏儒」既為長期刻板印象，2012 年上台之安倍政權雖努力進行結構調整，2015 年美日「新防衛指針」尤其值得關注，但在 2020 年安倍突然辭職下台後，自民黨如何整合與日本後續戰略調整仍需觀察。

(6) 法國：法國雖為歐陸傳統大國，但目前經濟體量與英國相當且僅為德國七成，且 1966-2009 年間長期游移於 NATO 之外，1965 年利用「空椅」政策壓迫歐共體在 1966 年達成「盧森堡共識」，既凸顯其國家利益高於整合前途之基本立場，2011 年後 EU 逐漸由早期「雙元（法德）協調」轉向「德國獨大」，也讓法國確認 EU 作為工具性存在。對 2017 年執政的 Macron 而言，如何取得相對美國與 EU 之獨立性乃當務之急；例如，近期介入北非、中東，乃至印度洋

---

<sup>22</sup> 因計算基準差異（採取 MPS 而非 SNA 制），事實上蘇聯在冷戰時期一直為第二大經濟體，至 1986 年才被日本超越。

與南太平洋事務等，都呈現其比柏林更強之國際事務積極性，至於國內政黨體系之複雜不確定則為主要變數。

(7) 英國：儘管 2016 年以來，歹戲拖棚的脫歐程序始終吸引主要國際注意力，實則英國在 1973 年加入歐體不久，1975 年便舉行首次去留公投，甚至 1999 年歐元區成立後迄今，仍以 EU 成員身分堅持保留英鎊獨立性，更別說自十九世紀乃至兩次大戰之前長期扮演霸權角色、英語作為全球最主要國際語言，以及目前仍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等，都讓它擁有一般國家所無之戰略視野、經驗與競爭潛力，至於美國與 EU 在 2008-10 年間的受創動搖，亦無異給了英國一次見縫插針的「再崛起」契機，尤其保守黨在 2019 年大選中獲得 1987 年以來最多席次，也是一大政治激勵，至於 2020 年拋出將派航母佈署西太平洋，戰略思路亦值得觀察。

(8) 土耳其：作為前鄂圖曼帝國核心，以及位居歐亞大陸交接之地緣位置，不僅是美國在冷戰初期拉攏其加入 NATO 主因（目的在制約蘇聯與俄羅斯自黑海南下），也是 Erdogan 在 2003-14 年長期擔任總理，隨後轉任總統並逐步強化集權統治，美國與 EU 始終漠視容忍的主要原因。特別是 2015-16 年後，土耳其成為 EU 阻擋難民潮衝擊其經濟發展之關鍵屏障，更使土國大膽擴張，例如 2016 年「幼發拉底河之盾行動」(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2018 年「橄欖枝行動」(Operation Olive Branch) 與 2019 年「和平之泉行動」(Operation Peace Spring) 數度越境攻擊敘利亞北部，2020 年 1 月國會通過派兵利比亞與 10 月介入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之間的納卡戰爭，都顯示其對外積極性。尤其 2017 年修憲後，Erdogan 總統任期最長可達 2028 年，強人政治已然鞏固。

(9) 印度：作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第二大人口國（估計將於 2027 年高於中國，若計入普查誤差則恐已超越）、除了安理會五強之外「唯二」公開擁核國，以及全球 10 個擁有航母國家之一，並作為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主導國家，儘管長期在國際體系中居於相對邊陲地位，自美國因 2009 年力推「重返亞洲」加以拉攏，以及 Trump 之「印太戰略」試圖建構四方同盟（Quad, 加上日本與澳洲），國際影響與發言權水漲船高。儘管如此，沉重的低端人口負擔與經濟轉型壓力，仍為 Modi 與 BJP 政權最大挑戰所在。

#### 肆、結語

總的來說，此時侈言美國霸權即將衰落，對多數仍受慣性思考制約者而言或難接受，但新世紀初以來的第二波衰落論爭辯，依舊提供參考視野。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許多人將「美國衰落」與「美中爭霸」進行邏輯聯繫，從歷史看來，實則無論中國朝代更迭或近代歐洲霸權興衰，都很難存在「無縫接軌」之單純取代現象，更可能的場景是某種「新均勢」（new balance of power）之浮現，亦即在投射成本遽增以致影響美國投射意願與相對能力，從而帶來全球體系結構鬆動與突出部份權力真空的情況下，所謂 G-9 世界之某種可能性也跟著悄然浮現；當然，本文屬個人意見，僅供參考，更歡迎有更多切磋討論。

其次，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發展，則是潛在霸權更迭與當前全球疫情蔓延對「民主化」之影響。例如在前述主要國家中，包括俄國 Putin（2000 迄今）、土耳其 Erdogan（2003 迄今）、德國 Merkel（2005 迄今）、日本安倍（2012-20）都幾乎成為該國二戰結束以來任期最長

領導人，2013 年接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也即將在 2023 年迎來修憲後的連任考驗，至於法國 Macron、印度 Modi 與即將卸任的 Trump 雖任期稍短，執政期間的「強人化」特徵都讓人印象深刻；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既是制度因應危機變局之自然演進，將於 2021 年就職之 Biden 因自身年邁與社會對立以致可能相對「弱勢」，則不能不說是美國在面對新一波全球結構調整時的「弱點」，也是其下一階段捍衛霸權時主要變數所在。

最後，法國繼 2018 發布《印太防務報告》，接著在 2019 年與印度聯合演習並更新前述報告，<sup>23</sup>2020 年底不僅再次與美日共同進行軍演，並宣布啟動新航母計畫，英國接著在 2020 年傳出航母伊莉莎白號有計畫進入南海未來並將佈署於西太平洋，<sup>24</sup>德國外交部則在 2020 年 9 月公布《德國－歐洲－亞洲：共塑 21 世紀印太地區準則》報告，<sup>25</sup>指出未來數十年德國的繁榮與地緣政治將取決於與印太國家的合作方式，日本在 2020 年底與德國防長會議中也邀請其派軍艦東亞；從某個角度看來，歐洲主要國家紛紛重啟更積極之亞洲戰略規劃與行動，或呼應近年「中國威脅」日增的聲浪，但另一方面，卻也不無填補美國因繼續相對衰退可能留下權力真空，預先思索自身

---

<sup>23</sup> See *La France et la Sécurité en Indo-Pacifique* (Paris: Ministère des Armées, 2018); *France's Defence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Paris: Ministère des Armées, 2019); David Scott, "France'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gional Power Projec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19:4(2019), pp.76-103.

<sup>24</sup> Niall Gray, "Will the UK Send Its Aircraft Carrier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iplomat*, August 31, 2020, <https://www.thediplomat.com/2020/08/will-the-uk-send-its-aircraft-carrier-to-the-south-china-sea/>

<sup>25</sup> See "Germany – Europe – Asia: shaping the 21st century together: The German Government adopts policy guidelines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eptember 1, 2020,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aussenpolitik/regionaleschwerpunkte/asien/german-government-policy-guidelines-indo-pacific/2380510>

作為之意味，畢竟它們並非根據美國「召喚」，而是各自據其獨立利益而來，其戰略意涵與想像空間值得關注。